

欧阳玄《圭斋文集》版本考

魏崇武

一、欧阳玄生平及诗文集

欧阳玄(1283-1358)字原功(又作“元功”),号圭斋,浏阳(今属湖南)人。延祐二年(1315),以第三人赐进士及第,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,累迁至翰林学士承旨。至正十七年十二月戊戌(1358.02.07)卒,年七十五^①。后追封楚国公,谥文。危素《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圭斋先生欧阳公行状》评曰:

历官四十余年,在朝之日居四之三:三任成均,两为祭酒,六入翰林,而三拜承旨。修《实录》、《大典》、“三史”,皆大制作。屡主文衡,两知贡举及读卷官。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、播告万方国所用制诏,多出公手。海内名山大川、释老之官、王公贵人墓隧碑铭,得公文词为荣。片文只字流传人间,咸知贵重,文章道德卓然名世。^②

此文记欧阳玄生平甚详,《元史》据以立传,可参看。

欧阳玄的诗文集名为《圭斋文集》,现存十六卷。其中,现存创作年代可考的最早作品是《天马赋》,为欧阳玄延祐元年(1314)参加乡试时所作。据危素所作《行状》,欧阳玄参加乡试前的创作情况大略如下:十二三岁时,曾于浏阳猿山的文靖书院赋梅花诗百首。二十岁左右,偶至浏阳郡城,受宪使卢挚赏识,结为忘年交,相互唱和。后随侍其父至道州,“境内胜概,题藻殆遍”。至大元年(1308),父卒,归浏阳。其后,虞汲分教潭州,每见欧阳玄所为文,辄为之击节,缮写成帙,亲题而寄其子虞集(时任国子助教)。由此,欧阳玄虽未曾一至京师,而声名已彰著于朝。然而,这一阶段的作品早已无存。

欧阳玄参加乡试乃至中进士之后的文稿,大部分在其生前就已毁于兵火。据宋濂《欧阳公文集序》记载:

公薨二十四年,其孙佑持持公集二十四卷来,谓濂曰:“先文公之文,

① 按,《元史》本传作“年八十五”,误。

② 《圭斋文集》卷16“附录”。以下简称“危素《行状》”。

自擢第以来多至一百餘册,藏于浏阳里第,皆毁于兵。此则在燕所录自辛卯至丁酉七年之间作尔。间有见于金石者,随附入之。子幸为文叙之以传。”^①

又据危素《行状》记载,至正十四年(1354),浏阳遭寇乱,欧阳玄“二兄一弟相继去世,亲属四百指死已大半,配冀国夫人谢氏避难郡城,亦没”。那么,一百多册的文稿应是毁于此时。欧阳佑持所持文集二十四卷,主要作于至正十一年(1351)至至正十七年(1357)之间,明洪武十四年(1381)时尚存。不过,由于当时未能及时刊刻传布,二十四卷文稿又再度毁于兵火^②。

明成化间,欧阳玄的存世诗文再度结集,并得以刊行。后来在清代又曾三度刊刻,并有多种抄本传世。今略考如下。

二、《圭斋文集》诸种刻本

1.明成化七年刘钊刻本

欧阳玄诗文集的首度刊刻,是在明成化七年(1471)。居于分宜防里(今属江西)的五世宗孙欧阳俊质及其子欧阳铭、欧阳镛以家藏残稿为基础,相继增辑,成十六卷(第十六卷为“附录”)。浙江督学宪副刘钊校其舛讹,又捐己俸,于成化七年予以刊行,名为《圭斋文集》。

然而,流传至今、均著录为“明成化七年刻本”的多部《圭斋文集》,却面貌各异。对此,黄丕烈早已提过:

此欧阳圭斋文集,余向得诸顾八愚家,盖明初刻也,已什袭藏之久矣。今春,陶五柳主人又以一本见示,虽同是明刻,而印本较前。故此本模糊处,陶本尚有清晰者,俾得补填一二缺字。陶本有缺叶并烂板,而此本反完善无损坏,则皆修板之故,不及陶本之犹是初刻旧观也。^③

今仅就国家图书馆所藏五部和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所藏一部,考察其漫漶

馆藏、 编号 卷、页	国图 7730	国图 7731	国图 7111	国图 11556	国图 XD6287	内大藏本
全书卷首、卷 15 末、全书卷末	序跋齐全	序跋全脱	只有宋序	原只有宋 序,后影抄 补全	只有宋序	只有宋序
卷 3,第 12 页	漫漶严重	脱	补刻	补刻	缺	缺
卷 5,第 16 页	缺	补刻	补刻	补刻	补刻	补刻

①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圭斋文集》卷首。

②(明)彭时《跋欧阳文公集后》,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圭斋文集》卷末附录。

③(清)黄丕烈《圭斋文集跋》,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七年刻本《圭斋文集》(编号 11556)卷末。按,黄丕烈跋共有三则。

(续表)

馆藏、 编号 卷、页	国图 7730	国图 7731	国图 7111	国图 11556	国图 XD6287	内大藏本
卷 7,第 6 页	漫漶 (A)	漫漶 (A+)	漫漶 (A+)	漫漶 (A+) 部分描补	漫漶 (A++)	漫漶 (A++)
卷 7,第 13 页	缺	补刻	补刻	补刻	补刻	补刻
卷 9,第 53 页	补刻	脱	补刻	补刻	补刻	补刻
卷 10,第 34 页	缺	缺	脱	部分抄补	缺	缺
卷 10,第 37/38 页	不缺	缺	不缺	不缺	不缺	不缺
卷 14,第 56 页	缺	补刻	补刻	补刻	补刻	补刻
卷 15,第 17 页	漫漶 (A)	缺	漫漶 (A+)	漫漶 (A+) 部分描补	漫漶 (A++)	漫漶 (A++)
卷 16,第 8 页	缺	缺	补刻	补刻	补刻	补刻
备注	二印本	三印本			四印本	
	1、标明“补刻”者,所补内容字体均同。2、加号越多表示漫漶程度越严重。3、此表主要反映阙脱之页的情况。漫漶之页,各本还有许多,此表不予罗列。					

程度、阙脱现象以及补刻情况(见下表),即可知众多成化七年刻本的真实情形比黄丕烈所说还要复杂得多:

依据各本的漫漶程度,结合阙脱、补刻情况,笔者认为明成化七年刻本《圭斋文集》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印次:①初印本:应该是卷首有宋濂、揭傒斯二序,卷十五末有彭时跋,全书卷末有吴节、彭时、刘紆跋。此初印本疑已无存本。②二印本:上述序跋齐全,但有缺叶、烂板现象,只补刻了卷 9 第 53 页,如国家图书馆藏编号 7730 本。黄丕烈跋所言五柳主人陶正祥经手的本子应属于二印本^①。③三印本:特征是仅存宋濂序,有多叶补刻,但仍有缺叶,漫漶情况较严重,如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 7111、11556 等本。④四印本:特征是仅存宋濂序,有多叶补刻,但缺叶多于三印本,漫漶程度也比三印本严重得多,如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室藏编号 XD6287 本、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^②。

已知明成化七年刻本《圭斋文集》存世者尚有近二十部,大多数笔者未能

①据黄丕烈跋第二则,陶正祥将其售予袁绶阶。又据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 34 相关著录可知,此本后又归于丁丙。

②上述诸印次大体可以成立,但仍有一些疑问不好解释:①第 3 卷第 12 页,为何三印本已补刻,四印本反而缺叶?②从漫漶程度看,7731 本与 7111、11556 本几乎一样,应该也属于三印本,但其阙脱情况相当特殊。不知这种情形仅仅属于 7731 本,还是有一批都相同?如果是后者,那么 7731 本有可能属于 7730 本与 7111 本之间的另一印次,而在时间上与 7111 本相隔很近,这样的话,成化七年本则有五个不同印次。

经眼。若将全部存本加以比对,是否会发现更为复杂的情形,不得而知。不过,从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,文化部批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《圭斋文集》列入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”,应该是失察了。国家图书馆将同印次的 XD6287 本归为普通古籍而不入善本室的做法,较为合适。

在这里,需要特别提及的是: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《圭斋文集》的底本是编号 7730 本,目录首页“扫尘斋积书记”、“礼培私印”两方印章以及卷末残留的“庚辰秋得此,壬午”字,足可证明这一点。影印本补足了所有缺叶,其中大部分与上述三印本或四印本的补刻叶相同,但还有第 7 卷第 6 页、第 10 卷第 34 页、第 16 卷第 8 页所补不知其来源。

总而言之,成化七年刻本是现存诸本的源头。

2. 清乾隆十三年浏阳绍文堂刻本

虽说成化七年刻本比后出的三种清代刻本存世数量较多,但在清乾隆年间,似乎在江西、湖南流传不广。因为历经灭明及平叛的两度战火,书籍散亡十分严重,欧阳玄之浏阳裔孙们显然没能见到成化本,而十分担忧《圭斋文集》的散佚。十五世孙、国学生欧阳启远继承父兄遗志,就家藏抄本重加校勘、辑佚,又请多人作序,予以刊行,是为乾隆十三年(1748)浏阳绍文堂刻本^①。此本现存不多,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、新疆大学图书馆等有藏。

绍文堂刻本卷首有旧序(明宋濂序)、旧跋(明彭时跋)、新序(清欧阳启远、杨锡绂、温福、周心骥、夏之蓉、吕肃高、黄明懿、王文清、聂日乾、周忠信、欧阳龙序)。卷十六“附录”除明成化七年刻本原有的元张起岩所撰欧阳玄之父《神道碑》、危素所撰欧阳玄《行状》外,于《行状》前插入明吴节《欧阳氏家藏亚中大夫碑跋》,《行状》后增入《圭斋文公传》(未著撰人)。从有彭时跋、吴节跋的情况看,欧阳氏家藏抄本的底本应是明成化七年刻本的初印或二印本,但又脱去原有的部分序跋。

绍文堂刻本虽经校勘,但错讹仍嫌偏多,第九卷更是多有阙文,算不上精善之本。不过,该刻本也有其价值:在辑佚方面,共辑得诗 4 首、文 2 篇;在部分作品上,可能利用了其余家藏文献,提供了有用的信息,比如:卷三《万竿烟雨图》一诗,绍文堂刻本比成化七年刻本多了题下小注“为用凯侄题”。同样,《墨竹》、《万竹图》、《陈抟睡图》、《蒲萄》、《子昂雪鹄》、《墨荔枝》、《寒雀梅》等诗的题下,绍文堂刻本均增加了“为某某侄作”或“为某某侄题”的小注。不过,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。

清张景星等《元诗别裁集》(中华书局 1975 年影印本)只选了欧阳玄《京城杂咏》(其七)一首,从“傍”字可知选自绍文堂刻本《圭斋文集》。

^①参见绍文堂刻本卷首诸序。

3.清道光十四年棣余山房刻本

到了道光年间，又新出现一种刻本——棣余山房刻本。此本现知约存十部。关于其校订、辑补、刊刻的经过，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八月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钓源族裔孙欧阳杰作《重刊圭斋先生文集引》云：

道光甲申（1824），始得浏阳本，读之狂喜，如获珍珠船，急钞藏篋衍，将谋重雕，而原本校雠未善，帝虎焉乌，不可胜数，且间有脱简，心窃病之。今年三月，又访得成化本残帙，中间缺第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六四卷，其第十三、十五两卷复朽蠹过半，虽可藉以补浏阳本之脱，而讹误亦所不少。……爱偕三弟介卿荣详加雠勘，参互钩稽，讹者订之，阙者补之，其不可考证者姑仍其旧，略为标注。又采辑群书，钞补若干篇，而原诗编列有未当者，为之改次。谨遵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定为诗文集十五卷，其十六卷改为附录，并恭录《总目》提要列诸卷首，以扬先芬。授梓于孟夏中旬，阅五月告竣。^①

从这段文字可知，棣余山房刻本的底本是源自绍文堂刻本的一个抄本，校以成化七年刻本残帙。然而，欧阳杰恐怕只见《总目》提要，而未见四库本《圭斋文集》。因为提要虽云正文“十五卷”、“附录一卷”，而四库本《圭斋文集》实际上仍分十六卷（“附录”标为第十六卷）。

棣余山房刻本在绍文堂刻本的基础上，又增辑赋1篇、诗2首、文20篇，但其中《罗浮凤赋》实为吴莱所作，当从删^②。校勘方面，棣余山房刻本因得成化七年刻本残帙之助，而使其文字质量明显优于先出的绍文堂刻本，更优于后出的南邨草堂刻本。

4.清道光二十六年新化邓氏南邨草堂刻本

新化人邓显鹤因编《沅湘耆旧集》，访求成化七年刻本《圭斋文集》而不可得，仅得绍文堂刻本。对于绍文堂刻本，邓显鹤评价颇低：“其书编划失次，讹谬滋仍，类坊间书贾所为，且其中多浅人贋作孱乱。”^③其实，若说“编划失次”，倒也言之有理；说“浅人贋作孱乱”，也不无可能。但若论“讹谬”，恐怕南邨草堂刻本自身更难逃此讥。

邓显鹤对绍文堂刻本的作品进行了重新编排，并将他自认为的贋作删去，补入家藏及友人所藏的集外文，“又敬录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四库简明目录》、《元史》本传、《行状》、《家传》、《像赞》、《先世神道碑铭》，与夫方志、选本各传及宋、彭序跋于前，为卷首。其续刻诸序跋则附录于后，为末卷，题曰‘浏阳邵文堂原本’，示不昧所自也”，于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七月刊成于邵州东山讲院。

①（清）欧阳杰《重刊圭斋先生文集引》，棣余山房刻本卷首。

②按，卷八之末补入《送刘文廷之清江录事序》一文，不能算作辑佚。因为成化七年刻本中有此文，只是棣余山房刻本的底本绍文堂刻本脱去而已。

③（清）邓显鹤《圭斋文集跋》，清道光二十六年新化邓氏南邨草堂刻本《圭斋文集》卷首。

此本刊成之后的当年十一月,邓显鹤却又从友人处得到了棣馀山房刻本,于是将棣馀山房刻本的辑佚作品按类附于各卷之末,并编制“补遗”目录,置于全书卷末。除去从棣馀山房刻本所补作品外,南邨草堂刻本辑佚作品共计诗1首、文7篇。

应该说,南邨草堂刻本对于《圭斋文集》的整理,还是有些功劳的,比如:辑得一些佚作;作品编排趋于合理;所加按语也有些价值;等。然而,这与南邨草堂刻本的大量妄改、妄删、妄增相比,实在是得不偿失。比如:“西宾”可以指塾师,也可以指幕友,而南邨草堂刻本改作“子师”,未必恰当(《永新龙母吴氏墓铭》)。《洞渊阁碑》、《居士欧阳南谷墓碑铭》、《明宗皇帝尊号册文》等文妄自删削的现象较为严重,某些文章(如《进辽史表》、《静修先生画像赞》等)题下原有的小注也常常删去。而在绍文堂刻本空缺处,南邨草堂刻本却又往往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擅自添字填补。这些情况出现频率相当高,因此,南邨草堂刻本是劣本。当然,它的现存数量也不很多,现知约存十部。

三、《圭斋文集》若干抄本

由于明成化七年刻本尚存多部,甚至在诸刻本中现存最多,后出的大多数抄本也就价值不大了。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编《全元文》时普查的记录,《圭斋文集》无明抄本,现存清抄本大致有以下数种:摘藻堂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诸阁本,以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金侃抄本、翁同书翁同龢校跋本,上海市图书馆所藏的何忠相等校跋本、南昌彭氏知圣道斋抄本、宝文斋抄本,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丁丙跋本,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林亭抄本等。因条件所限,且关注所有抄本的必要性不大,故笔者只考察了北京地区的藏本或影印本^①,简介如下:

1. 金侃抄本

从全书序跋只存卷首宋濂序以及全书的残缺情况看,金侃抄本可能抄自明成化七年刻本的三印本。

金侃抄本文字清朗美观,错讹较少,质量较好。但也偶尔出现妄改现象,比如《义门赋》中有“珪赴弟以瘐死兮,绮代亲而自囚”句,金侃抄本改“绮”为“琦”。其实,从《元赠奉议大夫枢密院判官骁骑尉追封浦江县子郑府君墓碑铭》可知,郑德珪是传主郑锐的伯祖,而郑绮是郑锐的六世祖,抄者以为珪、绮应属同辈,故擅改致误。此外,金侃抄本偶尔对漫漶之处的文字,有臆测现象,比如: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成化七年刻本(属二印本)《赵忠简公祠堂记》“是祠岂细故哉”、“详见《宋史》”二句,成化七年刻本的三印、四印本于“细故”二字及“详见宋”三字极难辨认,金侃抄本则分别作“可已”、“书诸国”。这显然是臆测的结果。

^① 诸种《四库全书》本中,仅选取文渊阁本加以考察。

2. 摘藻堂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

《四库全书荟要总目》著录：“今依前江西巡抚臣海成所上明欧阳铭刊本缮录，据元汪师模本、明欧阳佑持本恭校。”^①这说明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的底本是明成化七年刻本。然而，所谓汪师模本见于揭傒斯序，但揭傒斯序并非为欧阳玄《圭斋文集》而作^②；所谓欧阳佑持本见于宋濂序，但该本在明成化七年刻本问世前早已亡佚。因此，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《圭斋文集》根本不可能据所谓王师模本和欧阳佑持本进行校勘，《荟要总目》的著录有误。

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卷首有揭傒斯、宋濂序。揭傒斯序在宋濂序前，这是与众本不同之处，应是根据两篇序文的写作时间先后所作的次序调整。另外，现存诸部成化七年刻本的阙脱之页，该本却都存在，可见其底本很可能是明成化七年刻本的初印本。不过，卷11删去长文《高昌偃氏家传》，只剩下两篇短文，极不协调。但总的来说，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是现存诸多抄本中有很高价值的一种。

3. 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

该本卷首有宋濂、揭傒斯序。它在内容上颇多脱文^③，比如：卷11删《高昌偃氏家传》；卷14脱《大师右丞相画墨竹》等五篇；卷15脱《祭子达老文》；卷16脱危素所撰《行状》，而以卷末《防里欧阳氏家藏亚中大夫碑跋》补入卷16，但却脱其落款，明人吴节的文章就此误作欧阳玄的文章；等等。根据其序跋及脱略情况来看，四库底本应属于成化七年刻本的二印本。

此外，四库本还存在一些难解的现象：比如卷8《送榴仲宾归安成诗序》中诗与文的次序以及部分文字，四库本与现存诸本皆不同；卷14《白麟溪三大字后》一文后半部分的部分文字与现存诸本均不相同；等等。这到底是誊抄马虎还是另有缘故，则不得而知了。

四库本也有臆改现象，如《赵孟頫神道碑》一文，抄者误认留梦炎姓叶、叶李姓李，而擅自改易。其实，元世祖本来是拿留梦炎和叶李进行比较，在四库本中却成了叶梦炎和李某的比较。这是抄者对《元史》不够熟悉，却又不肯忠实地按底本抄录而导致的错误。总而言之，四库本的质量相当不理想。

4. 翁氏兄弟校跋清抄本

翁校清抄本卷首有四库提要、宋濂序，卷四、卷八末有翁同书题识，卷末有

①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第1册，台湾世界书局1990年影印，第196页。

②关于这一点，清丁丙早已指出，近人陈乃乾、李松筠等先生亦已予以辨正。可参看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34，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第9册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807页；陈乃乾《读书识小录》，《陈乃乾文集》（上册）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90页；李松筠《欧阳玄〈圭斋文集〉发覆》，《龙门杂志》1947年第3期。又，“汪师模”应作“王师模”。

③也可能是因其残缺或其他原因而删去。

吴节《防里欧阳氏家藏亚中大夫碑跋》及彭时《跋欧阳文公集后》以及彭元瑞、翁同龢题跋。其底本不详。

据翁氏题跋,翁氏兄弟手中共有两个抄本,一个是彭元瑞抄本,一个即此翁校清抄本^①。而据彭氏题跋,彭抄本抄自《四库全书》底本,但后来又以另一种内容更全的明成化七年刻本进行过校补。翁校本与彭抄本均有脱讹之处,翁氏兄弟对其进行了参互校补。翁校本原抄较为潦草,错误不少。此本校改文字多与金侃抄本同,可见翁氏也有可能利用金侃抄本进行过校勘。

此本质量虽不十分理想,但也有一定价值。比如关于《早欧听秋居士园池》一诗中“早欧”的批注,可以纠正部分版本的错误;又如《许衡神道碑》一文有数处校补之字(分别有39字、13字等),使有些突兀不顺的原文恢复了真正的面貌;此外还有不少地方的校改也很有价值。另外,此本有不少圈点以示赏鉴,是其特色。

根据以上考察,《圭斋文集》的版本源流是比较清晰的。但在《圭斋文集》时,应注意明成化七年刻本存在不同印次的情况,尽量选择较早印本。那么,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是方便且合理的选择。其余版本中,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相当有价值,而南邨草堂刻本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质量不佳,须谨慎使用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

^①此本的彭氏题跋应为过录。